

【主持人语】(河南大学 张克定教授) 体认语言学是王寅教授将认知语言学本土化而提出的一种新兴理论, 倡导“现实—认知—语言”这一核心原则, 为各个语言层面提供了统一的解释方案, 得到了学界众多学者的积极响应。为反映此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刊特推出“体认语言学研究”专栏, 共收录6篇论文。王铭玉、康喆文一文以人本观和体认观为切入点, 探讨了符码体认、符喻体认、符间体认、符化体认和符域体认, 并据此提出了构建体认符号学的构想; 王寅一文认为体认语言学融入了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后现代哲学的体验人本观, 具有更为开阔的哲学视野, 据此勾画了体认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框架, 并对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张克定、张晓一文认为体认者在体认抽象方位关系过程中具有主体性作用, 抽象方位关系的体认理据为抽象实体的空间化机制, 抽象方位关系构式具有必备性限制条件和语义限制条件。刘玉梅、王敬媛一文探讨了 in 空间关系中界限的体认基础和体认方式, 发现 in 在空间维度、完整程度、形状形态和存在形式等方面灵活多变, 而决定 in 空间关系的关键因素则是其对射体的包围程度和包围力。廖光蓉、刘嵩一文在体认语言学框架内讨论了“裸 X”中“裸”的4种意义重构情形, 认为这几种意义重构多为一个语法化和去语法化糅合并进的过程。李鑫颖、李勇忠一文探讨了体认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之间的镜像互动性, 发现英汉跨类表量结构在通用度和浮游性方面存在异同, 跨类表量现象具有双重机制性。我们相信这些成果会有力推动体认语言学向纵深发展。

## 后现代体验人本视域下的符号体认观

王铭玉<sup>1</sup>, 康喆文<sup>2</sup>

(1. 天津外国语大学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 天津 300204;

2. 陕西师范大学全球区域与城市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后现代体验人本观以“体认”为核心, 反映了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趋势。符号学把世界划分为语构、语义和语用3个符域, 它们与语言哲学构成了内部的相互关联。我们可以据此从符码体认、符喻体认、符间体认、符化体认、符域体认等方面分析符号生成过程中的体认观, 甚至可以尝试构建符号学的一门新型分支学科——体认符号学。

关键词: 后现代; 体验人本; 符号体认观; 体认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21) 02-0001-08

收稿日期: 2020-05-06; 作者修订: 2020-08-07; 本刊修订: 2020-12-23

基金项目: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中央文献核心语汇多语种词典编纂和数据库开发”(KYD19027);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习近平用典中俗语俄译的认知研究”(TJYYQN20-007)

作者信息: 1. 王铭玉(1958-), 男, 河南洛阳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语言符号学, E-mail: mywang2@163.com; 2. 康喆文(1990-), 女, 陕西西安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符号学、语言学和俄罗斯人文地理, E-mail: zhewenkang@126.com。

## 0. 引言

20 世纪 70、80 年代,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文学中脱身而出, 急剧蔓延, 迅速在文化、艺术和社会运动中扩展开来。鉴于后现代思潮与生俱来的“流浪”特性, 学者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界定至今争论不休, 但大部分学者认为, “后现代”主要不是指时代化意义上的一个历史时期, 而是指一种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至少可以从 3 个层面加以理解: 文学艺术上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和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王治河 1993: 4) 作为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 后现代主义成为了继西哲研究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转向、语言论转向后的第四大转向。后现代思潮的一个认识基点就是对一切理性主义和现代性思想的普遍质疑、怀疑和解构。(黄秦安 2012: 49) 以反传统、反基础、非理性、去中心化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哲学再次将“人本观”纳入视野, 对语言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后现代哲学家凸显了被淹没的人本观, 大力倡导从感知和体验的角度来解读心智、理解语言, 揭开了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研究语言的新篇章。(王寅 2012: 13)

王寅教授为首的一批体认语言学学者经过 20 多年的思考和探索, 提出了“体验人本观”(embodied humanism view), 认为“人本”是“认知”的基础, “认知”是通过“人本”实现的。(王寅 2013: 5) 王寅将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提出的“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修正为“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即心智和语言都是来自对现实世界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体认观一方面传承了乔姆斯基和认知语言学突出从人之心智角度研究语言的基本取向; 另一方面更突出后天的实践观, 即语言研究必须强调人对现实世界进行的体验。(王寅 2014: 61-67) 体认语言学以哲学理念为主要取向, 采用理论性分析的方式博采众长, 将推动中国本土语言学理论发展为己任, 为语言学研究乃至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构建提供了新的路径, 不失为极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探索。

要探究“体认”与符号学的关系, 不得不提及认知符号学。认知符号学是一门从认知角度研究意义的学科, 它试图对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文化符号进行认知研究, 寻求对人类意义生成的理解。(苏晓军 2007: 121) 认知符号学自 1995 年首次出现(胡壮麟 2013: 6) 至今, 它的发展体现出如下特征:

- 1) 基于认知语言学中的体验观点阐释符号的形义关系和符号的象似性特征;
- 2) 从皮尔斯符号学的视角讨论认知语言学;
- 3) 认知符号学属于人文还是科学的立场性问题;
- 4) 认知科学的演进与符号学的关系;
- 5) 认知符号学在文学、口译、教育、自然灾害防控、建筑等领域的应用。

可以看出, 认知符号学目前还处于拓展阶段, 但始终围绕着关于思维的认知科学与关于意义的符号学。在认知符号学中, 认知的焦点放在对感知的输入结构的研究上, 而符号学的焦点则放在对表达的输出结构的研究上。(苏晓军 2007: 121) 如果说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是“现实—认知—语言”的感知输入过程, 那么语言符号学研究的则是“语言—意义”的表达输出过程。更进一步讲, 任何符号想要获得意义, 实现符号化也必须首先被感知和体验, 然后是认知和识别。符号学把世界划分为语构、语义和语用 3 个符域, 3 个符域实际上均未脱离人对符号的影响。为了彰显后现代主义人本精神对符号学的观照, 结合符号学中经典的三

分法原理,可以从符号的体认观出发将符号研究放置于符码体认、符喻体认、符间体认、符化体认和符域体认等层面展开。

### 1. 符码体认

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彼此不相容或是部分不相容的符码(或语言)进行互动时,就产生了符号过程。(库尔 2014: 69) 符号传递的过程也是意义产生的过程,其间必然经过信源产生时的编码过程和信宿接收时的解码过程。符码组织并且决定着符号的文本意义,它携带着一种意义结构将有限的符号媒介组织起来传递无限的信息,实际上体现了符号传递过程中的体认模式。这一体认模式基于符号与客观现实的互动和心智中的意识加工,是个体在结合个人心性和公共意识后对符号意义进行阐释的结果。然而对符号意义的阐释并不一定能够通过解码完成,在传递过程中必然会有信息的流失,这与个体的体验与认知息息相关。例如在翻译活动中,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符码的转换实际上烙印着译者主体的体认模式,是译者在对源语世界和译语世界共同体验和认知的基础上做出的符号阐释行为,与作者的编码体认模式和读者的解码体认模式不尽相同,这便造成了源语文本意义阐释的不同。此处也印证了王寅在认知翻译学中的观点:翻译既具有现实层面的体验性,又具有认知层面的主观性。(王寅 2017: 6)

从“符号—物”的二联体属性上来讲,符号本身具有物质属性,这一属性使符号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来看,根据符号阐释与物的关系,文本的符码可分为强编码和弱编码。强弱编码的区别实际上在于为文本提供阐释空间的不同。强编码文本的符号性强,文本更易于阐释,弱编码的符号性弱,个体可以在文本阐释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完成意义的获取过程。比如,以旅游景点信息识别为例,“故宫”“长城”体现的就是强编码文本,对其阐释有严谨的历史文化作为识别的依据。而以“象”命名的景点其编码的符号性强弱程度就不一样。桂林的“象鼻山”因酷似一只站在江边伸鼻豪饮漓江甘泉的巨象而得名,象似度较高,属于中度编码文本;浙江象山县三面环海,两港相拥,因县城西北有山“形似伏象”,故名象山。这里的“伏象”完全靠引导性揣度,属于符号性较差的弱编码。因此,符号传达的过程必然带有对客观现实的体验和认知,符码组织符号文本的意义常常是体认性的。

### 2. 符喻体认

起源于修辞学研究的隐喻在哲学领域、语言学领域和认知领域一直受到热议,这里将隐喻看作一种符号表意机制来进行探讨。体验哲学的基本主张为: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王寅 2002: 83) 隐喻式的思维是一种在感觉思维基础上沉淀人类文化基因的思维方式,它已成为人类思维的一种本源性的和本然性的思维能力,是人类的一种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思维。(徐盛桓、廖巧云 2017: 11)

王寅(2017: 7)对思维的认知过程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认知过程可以归纳为:互动体验—意象图式—范畴—概念—意义。互动体验是人与客观外界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感觉、知觉和表象;体验经心智加工构成意象图式,即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多个认知模型构成理想化的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它们是形成原型、范畴化的基础;而范畴化又是人们进一步形成事物概念和意义的基础。范畴、概念、意义共同构成事件认知域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

随着人们在长期实践中的感知和体验的加深,逐渐形成了高度概括性的范畴和结构稳定的基本概念,隐喻为抽象概念的形成提供了认知工具和认知方式。符号经过了现实到认知的体认过程和概念抽象过程才产生意义,符号的表意机制也要经过隐喻的思维过程,思维过程必然离不开体认。

隐喻在语言符号表意层级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符号所指不断变化衍生的体认途径。根据语言符号的层级性,一级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作为一个整体捆绑的结构成为二级符号中新的能指,与二级所指的附加意义结合,成为新的符号。符号的层级系统根据附加意义不断衍生出新的符号,具体有多少层级需要靠主体的认知程度和阐释来决定。例如“铁石心肠”是符号所指层级意义衍生的结果,“铁石”的一级所指为铁、石头等具体实物,二级所指根据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体验,将“铁石”的“硬”抽象为人心肠硬。又如“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符号“镜子”在这句古话中被阐释为不同的意义,古人基于对原有“照镜子”概念的理解去重新关联新的概念“历史”和“人”,使得“镜子”的符号所指出现新的意义。

从符号象似性上来看,隐喻是抽象程度最高、最具象似性的象似符号。象似性作用不是存在于符号和所指对象的物理性质中间,而是依存于“相同的”知觉结构或关系系统之间。(王铭玉 2004: 404) 隐喻的符号化过程实则在于初始符号与新衍生符号所指意义之间的象似性。根据体验人本观的立场,语言符号的形成基于人对外部世界的模仿及自身的经验结构,语言符号和现实世界的联系是基于人的认知加工。例如语言象似理论认为,象似性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如距离象似性、数量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标记象似性等等。(王寅 1999: 4-7) 隐喻象似有语法隐喻、约定俗成隐喻、诗歌隐喻等。探究隐喻象似发生的理据可循着“现实—认知—语言”这一体认线索进行。如林正军、张姝祎(2018: 26)认为语法隐喻语义发生的理据与人类种群的跨区域分化、跨时代衍化和个体年龄、社会角色的改变等因素有关。因此,象似性的机制和隐喻化的思维为探寻符号意义的生成和符号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提供了体认的视角。

### 3. 符间体认

“间性”是事物间关系的抽象概括。目前在哲学、文学、翻译等领域有关间性的研究涉及主体间性、文本间性、文化间性、媒体间性等。如主体间性主要研究一个主体(或意识)是怎样与另一个主体(或意识)相互作用的。(程志民、江怡 2003: 339)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符号的间性可以是符号自身衍生出的符号各个层级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符号构成文本之间的关系。在上文中我们提到隐喻化思维是符号表意的一种方式。在符号学视域下,隐喻现象是一种意义的增长和延伸,符号意义的生长是动态的、构建的和未完成的,意义是符号间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就是符号间性。(吕红周、单红 2014: 75-79)

符号间性的产生离不开主体人对符号的构建和阐释。符号间性通过主体与客观世界的联系产生,这种联系的方式在于“以概念的方式在思想中对世界的占有和支配,这种占有与支配中体现和表征着人的这一主体位置,构成了与世界客体的对立统一”。(王铭玉等 2013: 513)从主体共性的角度来看,主体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民族文化、道德规范等因素综合影响对符号意义的构建和阐释;从主体个性的角度上来看,个体的生活实践、知识储备、情感态度、心智运作等因素构成个体自身的世界图景,影响了对客观世界认识和概念化

的形成。例如“龙”在封建时代是皇权的象征,在中国古代民间神话中代表着驱灾、辟邪、祈福,在现代“龙”是象征祥瑞的文化符号,而西方国家常把“龙”和邪恶画上等号。又如古希腊神话中“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爱鸟,在俄罗斯人眼中“猫头鹰”是智慧的化身,英文中也有“as wise as an owl”(像猫头鹰一样聪明)的谚语,而在中国文化中“猫头鹰”则容易给人带来不祥的联想。

符号构成文本之间的关系即符号的互文性。在文本层面,互文性强调A符号文本与其构成文本之间的关系,即A符号文本与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改造的符号文本(A<sub>1-n</sub>)之间的关系。(王铭玉2016:7)然而任何符号文本,都在文本边缘之外或表达层之下,携带着大量没有进入文本本身的因素。(赵毅衡2010:2)符号文本之间已然充斥着这种隐性的关系。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 2016:189)称“我发展出了被结构主义忽略的两个方向:一是话语主体;一是历史的维度。”在过程主体理论中,克里斯蒂娃认为主体是由意识主体和无意识主体两部分组成。意识主体是一种文化现象,产生于文化、象征之中;无意识主体源于身体,寄身于自然或符号世界之中。(王铭玉等2013:144)历史的维度则将历史文本和社会文本纳入符号文本间的关系中。这就将符号文本由结构主义“关起门来说暗话”的静态模式转向后结构主义“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动态研究。若是从现实、认知与符号的关系来理解,符号文本间的隐性关系正是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抽象、创造和使用才“促使符号的意义逐渐脱离原物和指谓对象,演变成由语法结构和具体使用语境所决定的纯粹的‘文本或符码’”(张之沧2013:30)。例如文学体裁的诗歌、散文、散文诗等类型,无一不是表达作者个人心性和生活体验的符号文本。我国古代诗歌理论文献《毛诗·大序》中评价诗歌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散文和散文诗同样诉说着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有人称大海是诗,沙滩是散文,贝壳是散文诗,离开了人的体认和情感,恐怕大海不再波澜起伏,沙滩不再金光闪烁,贝壳也不再璀璨夺目。

#### 4. 符化体认

符号化的过程即事物变为符号,能够起到符号作用的过程。符号化的过程也是认识主体与客观世界互涉的过程。主体通过观察和感知,将未知的事物用自己认知定式中原有的符号加以识别和阐释,赋予符号新的意义。比如四川成都有一座著名的“官帽山”,人们解释为“天府之南官帽山,古人以形似官帽而名之,巍然壮观,雄峙千年。”古人就是用自己的观象体验,用熟知的符号赋予一座自然之山新的意义。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信息客体观念化、符号化的过程依赖于认知主体所处的思维场、文化场和心理场。思维场为人脑创造符号和使用符号提供生理基础。文化场作为主客体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精神规约系统,为符号意义的衍生提供了可能性,但从另一方面又制约符号意义的生长。心理场是主体感知客观世界后在心理上形成的心理印记,这一心理印记为符号在外界找到表达和寄托心理内容提供了形式。

符号学家皮尔斯将思维过程引入符号化过程,根据符号的生成情况将符号分为第一项符号、第二项符号和第三项符号。第一项符号为性质符号,它以感觉或知觉的方式存在;第二项符号为对象符号,是人们的经验或活动;第三项符号为关系符号,是思维符号。3种符号分别对应符号的3个关联要素: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解释关联物。媒介关联物指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它与所表征的对象关联物存在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由解释关联物进行

抽象思维而建立，而解释关联物正是“一种以思维或符号为核心的第三项存在”。(王铭玉等 2013: 52) 也就是说，媒介关联物并不能完全代表对象关联物的意义，还需要经过主体的解释，也就是认知者与客观世界间的互动和体认。皮尔斯把“解释”分为“情感的解释”“有力的解释”/“心智的努力”“逻辑的解释”。“情感的解释”是一种纯感情的、自然的感受，“有力的解释”和“心智努力”是一种有意识的认知活动，而“逻辑解释”是一种理性认识。(郭鸿 2008: 54) 皮尔斯的三位一体思想强调了符号化过程中人类认识的过程、方式和结果。首先，从性质符号到对象符号再到关系符号就是人类认知世界由表及里的过程；其次，由感知通过经验再到思维的过程体现着人类用已知表达未知、探寻未知的思维方式；而符号最终的生成结果也是人类心智推演的结果。“三位一体”思想仍能用“官帽山”命名过程来解释：此山本是一座自然山，当人们需要把它作为认识对象来认识时，就用已知表达未知的方式做了符号推演。可以说，皮尔斯符号学实则强调了符号对个人认知环节起到的关键作用。换言之，人是符号化过程的媒介，符号化必然经过人的现实体验和认知。

### 5. 符域体认

“域”即“疆域、范围”。符号域指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符号域”的概念首先由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洛特曼 (Yuri Lotman) 提出，洛特曼提出此概念旨在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文化，进而提出了一种符号论的文化观。若从语构、语义、语用的角度看，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可以包括符号之文本、符号之生成和符号之交际等内容。洛特曼认为，文本是文本内各种关系的“恒量系统”，文本是具有符号性质的文学作品实现“人工产品”的空间。(赵爱国 2009: 2) 符号文本是文本内符号系统集结、排列的载体，之所以认为文本是“人工产品”，是因为符号文本必须具有真实性，才能使符号的阐释者与文本发生互动。这里的“真实性”来源于文本生产者基于眼前现实所形成的语言世界图景，而人类体认的相通性使这种“真实性”得以传递。例如一部文学作品通常因被翻译为多个不同的语言版本而享誉世界，这同样是基于不同语言携带者共通的体认。正如赵毅衡 (2015a: 22-24) 所言“任何接受者，不可能接受一个对他来说不包含真实性的符号文本，这是意义活动的底线。文本内真实性，需要文本内各元素互相对应相符，而相符的原则与常识相融通。”也就是说，符号文本只有得到真实的阐释才能获得生命，阐释的前提在于文本创造者和接受者互通的体验和认识。“原则与常识”可以是民族文化背景、某一时代的价值观、社会公约，也可以是个体共同的生活体验、自我意识的交集等等。文本的创造者和接受者是符号交际过程中的主体，他们为符号文本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搭建了桥梁。

例如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脚下坐落着美丽的“蓝月湖”，旧时人们也称为“白水河”，因湖的形状像一轮永恒的蓝月而得名。云南纳西族的古老宗教文献《东巴经》曾记载，古时人类遭受洪水，陆色二神用筏子将子民引渡到白水河畔的陆地，又把筏子变成闪着蓝光的宝石盘子，那盘子似一轮吐着蓝光的月亮。“蓝月湖”命名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纳西人世代流传的古老传说和对自然的理解和认识。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作为主体的生命体对自然环境界中的事物赋予自身物种特有的意义，在主体的解释行为（即符号过程）中，环境界和生命体的特征得以呈现。”(王新朋、王永祥 2017: 145)

文化为符号的生成和使用提供了重要环境。按照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观点，文化是信息产生、流通、加工和存储的集体符号机制。它既是集体记忆，也是生成新信息的程序。它

调节人类行为和人类给予世界的结构。(郭鸿 2006: 4) 社会文化环境通过符号交际主体的心理认知形成集体特定的符号机制,这一机制长期存储在人的大脑中,反过来影响符号交际主体信息的传递和接收,并在主体不断的体认中得到更新和发展。例如宗教习俗作为一种典型的集体符号机制,以礼仪、节日、风俗、穿着、饮食等不同的形式制约着教徒们的日常行为,长此以往形成了世界各地宗教与众不同、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

#### 6. 符号体认观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探讨

既然符号学研究的是人类表达意义的方式,那么在认知科学以自然科学的姿态不断侵袭人文科学的大背景下,符号的体认观依旧离不开对人脑“黑匣子”的探索。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homas Sebeok)认为,符号学的另一名称即认知科学。认知科学能够运用生物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理论模拟人的行为及心理过程,以此加强符号学原有的认知倾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符号学界就出现了“人工智能转向”的口号,人工智能(AI)符号学关注“心—物”或“心理—生理”认识论关系的问题,一是研究在机器或大脑中体现的人工的和天然的“思想语言”在指称外界或诸如意向、信念、知识等内界时产生意义的方式,以及被其运用者(人或机器)用作手段以达到特定目的的方式;二是帮助认知者在探索人心和机“心”时提供特定的符号学行为的形式模型。(李幼蒸 2007: 500-505) 人工智能符号学的核心实际上围绕“人如何表达意义”这一问题展开,借助自然科学的技术,力图把符号化过程中人的体验和认知用更为简单的计算机符号模型呈现出来,以此为元符号去解释更为纷繁的符号现象。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向脑神经科学的靠拢会削弱符号学的人文本色。正如赵毅衡(2015b: 114)所言“心灵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体,不应该统一量化答案,心灵问题的核心部分是超越量化的,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最终解决。”笔者认为,早在符号学建立之初,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和皮尔斯符号学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已经决定了符号学身兼二体的性质。符号的体认观需要从符号生成的内部过程入手加以阐释,也需要物理实验和客观数据进行佐证。

#### 7. 结语

符号化的意义世界必然是主体将符号对象“人化”了的世界,符号化的过程离不开主体对客观世界的体验与认知。根据后现代哲学视野下体认语言学的语言生成原则“现实—认知—语言”,我们可以将符号生成的认知路径归纳为“现实—体认—意义—符号”。这一路径符合符号生成的现实过程,同时也能够突出体验人本观在符号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认为,从人本角度阐释符号现象具有很大的扩展空间,由此倡导建立符号学下的分支学科“体认符号学”。新时代我们需要这门文科,我们期待着“体认符号学”大行其道。

#### 参考文献:

- [1] 程志民,江怡,主编.当代西方哲学新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2] 郭鸿.文化符号学评介——文化符号学的符号学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2006,(3):3-9.
- [3] 郭鸿.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 [4] 胡壮麟.我国认知符号学研究的发展[J].当代外语研究,2013,(2):6-10.
- [5] 黄秦安.后现代哲学思潮与科学哲学的重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47-52.

- [6] 克里斯蒂娃. 主体·互文·精神分析: 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 [M]. 祝克懿, 黄蓓,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 [7] 库尔. 生命符号学: 塔尔图的研究进路 [M]. 彭佳, 汤黎,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 [8]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9] 林正军, 张妹祎. 语法隐喻的语义发生理据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8, (5): 26-33.
- [10] 吕红周, 单红. 略论隐喻的符号间性本质 [J]. 外国语文, 2014, (2): 75-79.
- [11] 苏晓军. 《复活节翅膀》的认知符号学分析 [J]. 外语学刊, 2007, (1): 121-124.
- [12] 王铭玉. 语言符号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13] 王铭玉. 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5): 1-10.
- [14] 王铭玉, 等. 现代语言符号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5] 王新朋, 王永祥. 环境界与符号域探析 [J]. 俄罗斯文艺, 2017, (4): 144-151.
- [16] 王寅. 论语言符号象似性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 (5): 4-7.
- [17]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2): 82-89.
- [18] 王寅. 哲学的第四转向: 后现代主义 [J]. 外国语文, 2012, (2): 9-15.
- [19] 王寅. 后现代哲学视野中的认知语言学——哲学第四次转向后的语言学新论(上) [J]. 外语学刊, 2013, (5): 1-7.
- [20] 王寅.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 [J]. 外国语文, 2014, (6): 61-67.
- [21] 王寅.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过程新观 [J]. 中国翻译, 2017, (6): 5-10.
- [22] 王治河. 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 [23] 徐盛桓, 廖巧云. 隐喻“意识感受性”理论模型 [J]. 外语学刊, 2017, (1): 10-16.
- [24] 张之沧. 身体认知的符号化机制 [J]. 江海学刊, 2013, (3): 30-38.
- [25] 赵爱国. 谈洛特曼对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建构 [J]. 中国俄语教学, 2009, (3): 1-6.
- [26] 赵毅衡. 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0, (2): 2-8.
- [27] 赵毅衡. 文本内真实性: 一个符号表意原则 [J]. 江海学刊, 2015a, (6): 22-28.
- [28] 赵毅衡. 关于认知符号学的思考: 人文还是科学 [J]. 符号与传媒, 2015b, (2): 105-115.

(责任编辑 周光磊)

##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An Embodied-Cognitive Semiotic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Embodied Humanism**, by WANG Ming-yu & KANG Zhe-wen, p. 1

The postmodern embodied humanism, with “embodiment” as its focus,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 of the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emiotics sees the world in terms of syntactic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which constitute an internal correlation with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we can develop an embodied view for the process of sign production, which consists of code embodiment, metaphor embodiment, intersymbol embodiment, semiosis embodiment and semiosphere embodiment. This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into a new branch of Semiotics—Embodied-Cognitive Semiotics.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Embodied-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by WANG Yin, p. 9

Cognitive Linguistics (CL) is combined with Sociolinguistics, forming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which has become popular nowadays in linguistic circl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When CL is nativized into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ECL), the above-mentioned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can be logically remedied into Embodied-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Compared with CL, the philosophical view of ECL is wider, which tries to integrate Marxist-Lenin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embodied humanism of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thus proposing a new statement of linguistic embodiment-cognitivity. We think it is identical with the purport of Sociolinguistic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scrib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Embodied-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Abstract Locative Relation: Its Embodied-Cognitive Motivation, Encoding and Constraints**, by ZHANG Ke-ding & ZHANG Xiao, p. 18

This articl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evised Reality $\leftrightarrow$ AEC $\leftrightarrow$ Language principle (where AEC stands for Agent of Embodiment & Cognition) in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discusses the embodied-cognitive motivation for Abstract Locative Relation (ALR), the linguistic encoding of ALR and the constraints of ALR construction. To be specific, ALR results from the active embodiment and cognition of AEC, it is motivated by the spatialization mechanism of abstract entity. AEC can construal the relation between a concrete entity and an abstract entity as ALR, he can also encode ALR into ALR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formation of ALR construction must satisfy two constraints, one is the obligatory constraint that an ALR construction must consist 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THEME, VERB and LOCATION, the other is the semantic constraint that the locative used in such a construction must have the meaning of being within a spatial scope.

**“Boundary” in Spatial Relation *in* from the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by LIU Yu-mei & WANG Jing-yuan, p. 24

The spatial particle *in*, while mainly representing the relation of “inclusion”, is tied with the important experiential concept “boundary” and rooted with rich embodied-cognitive groundings *in* physical life. Taken a view from how *in* is used, our cognition of boundary enjoys both wide flexibility and some restraint. The flexibility on